

【华夏文化典藏书系】

大唐王朝历史之谜

—— *Da Tang Wang Chao Li Shi Zhi Mi* ——

张剑光 周志明·主编

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【 华 夏 文 化 典 藏 书 系 】

大唐王朝历史之谜



张剑光 周志明·主编

陕 西 旅 游 出 版 社

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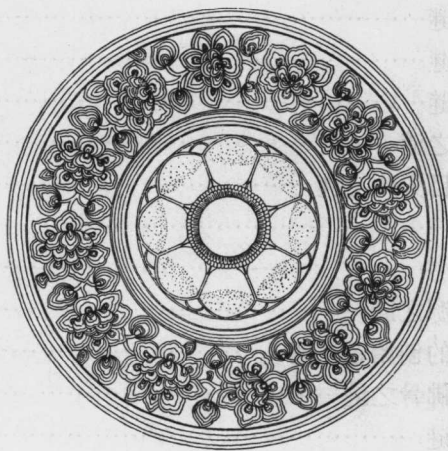
录

隋文帝死因之谜·····	(1)
隋炀帝开凿运河之谜·····	(7)
隋朝败亡之谜·····	(11)
李唐皇室血统之谜·····	(17)
李建成庸劣之谜·····	(23)
唐太宗废太子承乾之谜·····	(29)
唐与回纥绢马贸易之谜·····	(34)
李靖兵法之谜·····	(40)
唐修《晋书》之谜·····	(45)
慧能创立禅宗南宗之谜·····	(50)
唐高宗恋母心理之谜·····	(56)
唐高宗废立皇后之谜·····	(61)
唐高宗昏庸之谜·····	(67)
骆宾王下落之谜·····	(71)
王勃“自没”之谜·····	(76)
陈子昂死因之谜·····	(81)
武则天身世之谜·····	(86)
宰相裴炎被杀之谜·····	(91)
永泰公主死因之谜·····	(94)
武则天长子李弘死因之谜·····	(97)
张易之、张昌宗死因之谜·····	(101)

武则天被逼下台之谜·····	(107)
武则天推崇佛教之谜·····	(114)
宫女红叶题诗之谜·····	(120)
李林甫口蜜腹剑之谜·····	(124)
杨贵妃所食荔枝产地之谜·····	(130)
王维辋川别业之谜·····	(136)
《霓裳羽衣曲》创作之谜·····	(142)
安史之乱起因之谜·····	(146)
马嵬兵变主谋之谜·····	(152)
杨贵妃下落之谜·····	(159)
长恨歌主题之谜·····	(163)
唐玄宗“传位”之谜·····	(168)
李白家世之谜·····	(173)
李白词真伪之谜·····	(180)
公孙大娘剑器之谜·····	(185)
杜甫死因之谜·····	(191)
杨炎死因之谜·····	(198)
柳宗元好佛之谜·····	(203)
永贞革新之谜·····	(209)
唐顺宗死因之谜·····	(213)
元稹变节之谜·····	(219)
元稹与薛涛关系之谜·····	(226)
白居易修筑西湖白堤之谜·····	(233)
李商隐与牛李党争之谜·····	(240)
甘露之变之谜·····	(244)
卢仝死因之谜·····	(250)

唐武宗灭佛之谜·····	(257)
杏花村之谜·····	(262)
唐宣宗身世之谜·····	(266)
王仙芝受降之谜·····	(270)
皮日休下落之谜·····	(274)
黄巢下落之谜·····	(281)
雕版印刷之谜·····	(287)
唐代宦官控制皇位继承权之谜·····	(296)
科举制度诞生之谜·····	(301)
唐代庄园之谜·····	(307)
唐代飞钱之谜·····	(314)
西安雁塔之谜·····	(322)
日本遣唐使之谜·····	(331)
鉴真和尚双目失明之谜·····	(337)
秘色瓷之谜·····	(342)
唐三彩之谜·····	(349)
中国烧酒起源之谜·····	(355)
水墨山水画的创始者之谜·····	(360)
唐代帝王迎佛骨之谜·····	(365)
唐朝厚葬之谜·····	(373)
唐朝冥婚之谜·····	(380)
唐代男子“惧内”之谜·····	(385)
唐代妇女化妆时尚之谜·····	(392)
唐代斗鸡之谜·····	(399)
《顺宗实录》作者之谜·····	(405)
《霍小玉传》之谜·····	(409)

《枕中记》主角原型之谜·····	(415)
石敬瑭称儿皇帝之谜·····	(422)
后周世宗柴荣出身之谜·····	(427)
花蕊夫人之谜·····	(430)
李煜与小周后之谜·····	(437)



元稹变节之谜

元稹、张籍、王建，都是白居易志同道合的诗友、新乐府运动的中坚，同时也都是杜甫的推崇者、继承者。元稹与白居易齐名，人称“元白”，他们的文学观点完全一致。可惜的是，后人对元稹的人格颇多诟病，故而损害了他的人格形象。

元稹，字微之，河南（今河南洛阳）人。家庭贫困，刻苦自学。贞元间举进士第。唐宪宗元和年间，他任左拾遗、监察御史等职，对权贵、藩镇的不法行为进行过多次弹劾。穆宗时期曾作过宰相，后历任同州、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，武昌军节度使，以暴疾卒于武昌，时年53岁。元稹在文学方面的成就，与白居易相同，在当时的文学革新运动中具有突出的进步作用。



著名的文学、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中对元稹的诗文评价颇高，认为元稹是绝世才士，但对元稹的为人颇有微词，指出“人品虽不足取，而文采有足多者焉”。他认为元稹是“工于投机取巧”，在情感问题上没有道德。陈先生说：

“微之之贬江陵，实由忤触权贵阉宦。及其沦谪既久，忽尔变节，乃竟干谀近幸，致身通显。则其仕宦，亦与婚姻同一无节操之守。惟窥时趋势，以取利自肥耳。”陈先生又说：“故观微之一生仕宦之始末，适与其婚姻之关系正复符同。南北朝唐代之社会，以仕婚二事衡量人物。其是非虽可不置论，但今日吾侪取此二事以评定当日士大夫之操守品格，则贤不肖巧拙分别，固极辽然也。”

这样一来提出了一个问题，我们见到的元稹在前期敢于上书论政，指斥弊政，在后期是否投靠了权贵而换得几个高的职务？的确在唐穆宗时期，元稹官为中书舍人，翰林承旨学士。后为裴度弹劾与宦官魏宏简结交，罢承旨学士之职，官工部侍郎。次年，裴度与元稹先后为相，两人政见不同，后同时罢相，元稹出为同州刺史。至唐文宗时他又被调回中央，为尚书省左丞，身居要职。后又受到排挤，出为武昌军节度使。人们不禁要问，元稹的这些高官职务，是否为变节后得来的？

著名的文史学家卞孝萱先生在《元稹“变节”真相》（载《华中师院学报》1979年第四期）一文中专门就元稹的“变节”进行了研究，对陈寅恪说的“变节”进一步作了阐述。早年元稹中明经和制举，得到了考官裴垕的赏识。由于他对权贵、藩镇、宦官的不法行为进行过多次弹劾，使当时已升任宰相的裴垕对他十分信任。裴垕的亲信裴度等人曾因上书受到他人陷害，元稹支持他们，并向皇帝讲清事情的原委，虽被贬官，而元稹自己并没有懊丧。不久裴垕提拔他为监察御史。元和五年（810年），元稹因与宦官的矛盾再次被贬，为江陵府士曹参军，他在诗中说：“惨舒在方寸，宠辱将何惊……此意久已定，谁能苟求荣。所以官甚小，朝野已势倾。”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

很自豪，对自己被贬官不感到悲观，因为他相信裴垍会对自己进行提拔的。

事不凑巧，第二年裴垍病卒，元稹在朝廷中的依靠没有了，他原来的酣歌之气没有了，变得忧愁起来。他在《感梦》诗中表达出了自己的这种心态：“前时予掾荆，公在期复起。自从裴公无，吾道甘已矣。”这首诗成了元稹变节的自供状。严绶和宦官的关系很好，任江陵尹和荆南节度使后，成了元稹的直接领导，元稹和宦官的关系本就不好，元稹的好友白居易对元稹十分担心。不料严绶到任后，并没有对元稹报复，相反两人关系相处很好，对元稹恩顾有加，这说明元稹巴结严绶成功了。元和九年，严绶、崔潭峻奉命讨伐对抗朝廷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，他们把元稹也带了去。元稹《葬安氏志》中说：“适予与信友约为浙行，不敢私废。”既然称“不敢私废”，即证明“浙行”是公事，“浙行”即山南东道之行。“信友”指宦官崔潭峻。元稹知道交结宦官是丑事，于是就煞费苦心地想出“信友”一词来，然而欲盖弥彰。此后，元稹又依附宦官崔潭峻、魏弘简，竟然荣登大位，官至宰相。

也有人持不同看法，认为根本不存在元稹变节的行为，应该清除泼在元稹身上的污水，并给予较为公允的评价，还原稹以历史的本来面目。

持这种观点者指出，《感梦》诗是不是元稹变节的“自供状”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《感梦》诗的意思。依照诗的内容，它可分为：梦前述情、夜梦裴垍、梦后忆梦、向僧述梦、因梦忆旧和感梦抒情六个部分。在最后一部分，诗人发出了“前时予掾荆”等四句的感叹，意思是：我以前被贬谪江陵，因为有裴相公在朝，随时寻找机会为自己分辩，所以自己还有

“复起”，即再任要职的希望。自从裴相公谢世，自己一贬再贬，再也无人为自己讲公道话，景况已不同于裴相公在世时，我只有“终老于穷贱”了。接着诗人又对白居易表示同情云：“白生道亦孤，谗谤销骨髓。”诗中所言“道”字，显然是指元、白的仕



途，不应解释为“道路”，否则“白生道亦孤”便不好解释，总不会认为白居易也有变节之嫌吧。诗人最后表示：“为师陈苦言，挥涕满十指，未死终报恩，师听此男子！”当是在回忆裴氏谢世后自己和白氏仕途的坎坷、宦场的艰难，表示要继承裴氏未竟的事业，坚持原先的斗争。

为弄清元稹是否变节，首先要考察裴垍卒后元稹的立场有无变化，《感梦》诗写作前后元稹的言行是否一致。裴垍卒后，元稹对其仍是感恩戴德，念念不忘。元和九年年底，政敌不让元稹有平叛立功的机会，突然将其调离淮西前线，令其西归长安，途中元稹有诗怀念裴垍《西归绝句》，十年三月，元稹贬为通州司马，六月，染病危重，不得不于十月北上兴元求医问病，途中又有《感梦》诗，盛赞裴垍对自己的关怀和支持，并向他人称颂了他的功德。元和十三年，元稹在《上门下裴相公书》中，再一次提到裴垍对自己和其他直臣义士的奖掖和提拔，并希望宰相裴度效法。不仅如此，元稹还一直与裴垍的亲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这说明了元稹对已故裴垍的态度并

未改变。

裴珪谢世，元稹失去了有力的支持，处境确实很困难，但他斗争的决心仍然是很旺盛，其诗云“半夜雄嘶心不死”、“为言腰折气冲天”、“此生如未死，未拟变平生”，可见一斑。其时，元稹位低职卑，政治上难于有所作为，他抱着“达则济亿兆，穷则济毫厘”的态度，尽自己所能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：如在当阳县以同情“囚犯”的态度处理案件；荆南少数民族骚动，元稹建议和平安抚；淮西吴元济叛乱，元稹积极参加平叛等。被贬官期间，元稹只能将“全盛之气，注射语言”。他编集了自己的包括新题乐府诗在内的诗集，还第一个站出来对杜甫反映现实、抨击社会的诗歌作了高度评价；在兴元与刘猛、李馀一起从事新乐府运动，写出了《乐府古题》等一大批抨击丑恶现实的诗歌。从中亦可见，诗人内心仍然同情百姓的苦难，愤恨权贵的跋扈，不过表达方式不同罢了。

与前期相比，贬职期间元稹确实没有惩办过违制的权贵，这是无权使然。但后期的元稹，实权在握，恢复了前期的锐气，如同州均田平赋、在浙东罢进海味，在尚书左丞任“振举纪纲，出郎官颇乖公议者七人”。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可以看出，元稹在贬职期间因政治地位下降，其斗争方式也必然有所改变，但他斗争立场未改，政治气节未变，以斗争方式的变化为依据断定元稹变节是不妥的。

其次，荆南节度使府与不申户口、不纳赋税而养兵四守、谋拒王命的河阳、镇冀、淮西等地方割据势力完全不同，严绶是朝廷的派出官员，他与使职世代相袭的藩镇头目也不一样。淮西叛乱时，严绶曾参与平叛之战；荆南六州少数民族骚乱时，严绶也设法和平绥乱。因此所谓元稹巴结藩镇严绶的实在

含义，至多也只是元稹巴结上司严绶而已，此乃封建社会中司空见惯之事，恐怕是不能用来作为元稹变节证据的。

平叛淮西时，元稹曾代严绶撰写过三篇书表文告，指责吴元济“丧父礼亏，干君志愆”、“擅胁仕徒，偷侵县道”，指出叛乱给百姓带来无穷灾难，“百姓日蹙，赋敛月如，天兵四临，耕织尽废。窃闻壮者劫而为兵，老弱妻孥吞声于道路”，劝谕淮西将士争取“自新之路”，警告吴元济放弃“非望之志”。可见，元稹对真正的藩镇——地方割据势力的立场是正确的，态度也是鲜明的。

严绶之所以没有打击元稹，可能还因为过去打击元稹的宦官集团是以吐突承璀为首的，与严绶当时的监军使崔潭峻不是一派，更与严绶本人无关。在宦官、朝臣均分党结的情况下，严绶没有必要打击一个与其素无冲突、且又能效力奔走的下属。而“恩顾偏厚”四字，是严绶卒后，其子为请求元稹为其父撰写行状，以向朝廷请求诏赠而说的套近乎的话，对它看得过真是完全没必要的。事实上，当元稹被迫离开平叛前线的时候，严绶与崔潭峻显然都没有为元稹说话，故元稹后来有诗云：“剧敌徒相轧，羸师亦自媒。”可见元稹与严绶、崔潭峻的关系只是一般的上下属关系。

再次，若是曲解了元稹《葬安氏志》的原意，自然是不见其真意的。其文云：“予稚男荆母曰安氏……近岁因婴疾，秋方绵痼。适予与信友约为浙行，不敢私废。及还，果不克见。”说的是元稹事先与“信友”——诚实不欺、严守信用的朋友有约，至期安氏重病在身，本不应离她而去，但因事先约好，不能单方面毁约，只好如期赴约，故称“不敢私废”。但等“浙行”返回，安氏已经病故。志文所记，正是这种追悔莫及之情。

崔潭峻当时是内常侍，官品与内侍省的副职相当。外出为监军使，更是威赫无比，是代表皇帝监视节度使行使军政大权的，实际职权远在节度使上，元稹时为“有罪遣弃”的青衫从事，品位低贱的小吏，怎会在自己的文章中，随便称与品位悬殊的崔潭峻为“信友”呢？

另外，元稹在江陵任职前后，曾三次遭到有宦官参与的诬陷与打击，因此而外贬长达十年。而崔潭峻此后一直是宦官集团“元和逆党”的重要成员，完全能够护救元稹，但崔潭峻却听任同党诬陷和打击元稹，坐视不理，这说明元稹与崔氏关系极为一般，不能算“信友”，也谈不上“依附”。

参加淮西平叛在当时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，元稹完全没有必要把它掩饰起来，说成是与“信友”约为“渐行”。从元稹的诗作中可见，元稹为自己能参加淮西平叛感到非常荣幸。如《酬东南行诗》云：“重喜登贤苑，方欣佐伍符。判身入矛戟，轻敌比镋铖。”正因为如此，元稹后来还把《为严司空谢诏讨使表》等三篇书表文告编入自己的诗文集子中，以留传后世。元稹也没有把自己与严绶、崔潭峻的一般来往看成是依附或是丑事。

持这种观点者强调，“渐行”说和“信友”说恐怕并不能作为元稹“变节”、“依附宦官”的证据。

元稹“变节”的个中缘由，看来尚待文史学家们深入探讨才能彻底解决。



元稹与薛涛关系之谜

元稹，与白居易齐名的中唐著名诗人；薛涛，中唐最杰出的女诗人，两人常有诗文唱酬，因此关于两人的风流韵事就成为耸人听闻的话题，有关的笔记诗话绘声绘色、煞有介事地传扬着元、薛的燕昵私会及其诗歌酬唱。那么两人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？

中唐女诗人中以薛涛最为著名。薛涛，字洪度，本是长安良家女，其父因官寓蜀，早卒。母孀居，家贫，沦落为官中乐妓。贞元五年（789），薛涛因事被罚赴边城松州，献《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二首》获释。归成都后，即脱离乐籍，居浣花溪。现在成都还有薛涛井、吟诗楼等遗迹。薛涛通晓音律，工于诗词，与诗人元稹、白居易、张籍、王建、刘禹锡、杜牧等都有唱和。王建《寄蜀中薛涛校书》对她有“万里桥边女校书，枇杷花里闭门居；扫眉才子知多少，管领春风总不知”的称誉。

武元衡镇守蜀地时，薛涛曾经奏请授为校书郎，未授职。

薛涛在中晚唐诗界有很高的地位。晚唐张为《诗人主客图》将中晚唐诗人分立六主，其下是客。白居易是广大教化主，孟云卿是高古奥逸主，李益是清奇雅正主，孟郊是清奇古僻主，鲍容是博解



宏拔主，武元衡是镶奇美丽主。其中，清奇雅正之上入室为苏郁，入室为刘畋、僧清塞、卢林、于鹄、杨洵美、张籍、杨巨源、杨敬之、僧无可、姚合，升堂为方干、马戴、任蕃、贾岛、厉元、项斯、薛涛。薛涛得与方干、贾岛等并列，且《诗人主客图》中所取女诗



人仅薛涛一人，可见她在中晚唐诗坛地位之高。今日流传的薛涛诗多五、七言绝句，篇章短小而情致俊逸清丽。

由于薛涛是个女诗人，名声才学令人叹服，后人总爱把目光集中在她身上。关于元稹和薛涛的关系，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。的确，后人很想知道元稹和薛涛的关系究为如何，元稹的人格道德是否很有问题，是否是一个朝三暮四、见异思迁、忘义负情的人？

最早记录元、薛韵事的是唐末范摅《云溪友议》的“艳阳词”条：“安人（仁）元相国应制科之选，历天禄畿尉，则闻西蜀乐籍有薛涛者，能篇咏，饶词辩，常悄悒于怀抱也。及为监察，求使剑门，以御史推鞠，难得见焉。及就除拾遗，府公严司空绶知微之之欲，每遣薛氏往焉。临途诀别，不敢挈行。泊登翰林，以诗寄曰：‘锦江滑腻蛾眉秀，化出文君与薛涛。言语巧偷鹦鹉舌，文章分得凤凰毛。纷纷词客皆停笔，个个君侯欲梦刀。别后相思隔烟水，菖蒲花发五云高。’”还云：“（元稹）乃廉问浙东，别涛已逾十载。方拟驰使往蜀取涛，乃有俳优周季南、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，善弄陆参军，歌声彻云。

篇韵虽不及涛，容华莫之比也，元公似忘薛涛，而赠採春诗……”其后，列代诸多文人笔记都认为这段记载十分重要，如宋代有功《唐诗纪事》等，均沿袭此说。

当代的很多著作，如谭正璧《中国女性文学史话》、张蓬舟《薛涛诗笺》以及苏者聪《论元稹与薛涛》文等都以这则资料为根据加以演绎，并且更广泛地收录一些著作中关于元、薛的种种艳闻。针对一些人认为《云溪友议》的记载是不可信的故事传说，苏者聪进行了反驳。他说即使是流传下来的小说也不能一概否定，虽然其中杜撰之事屡见不鲜，但小说家亦有可能补正史之疏漏、记逸事之长处，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，就将小说笔记全盘否定，是不足以服人心的。

不同意上述观点者认为这段资料存在着明显的疏漏，提出元和四年（809）三月七月，严绶究竟到过成都还未可知。《新唐书》对严绶元和四年之事没有记载，但《旧唐书·严绶传》记载道：“四年，入拜尚书右仆射。”乍一看，元和四年严绶已经入朝，不在成都，未有撮合元、薛的可能。但细加斟酌，可知这条记载十分笼统。如果严绶在元和四年三月至七月间确实到过成都，七月以后入朝，亦可记载为“元和四年，入朝”。因此，据此不能断定严绶在元和四年没有到过成都。

有人认为笔记小说中关于元稹和薛涛的艳事纯粹是子虚乌有的事情。

他们认为要探讨元稹、薛涛是否有艳情，首先要证实两人是否有见面的可能，这就需要更多事实佐证。元和四年三月，元稹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东川，而薛涛自长安流落蜀中，沦为歌妓，出入幕府，“历事十一镇”，自韦皋镇蜀五六十一年间一直住在西川成都府，“侨止百花潭”，“居碧鸡坊”。东川、西川虽

为地邻，但相隔数百里，来往很不方便；两川虽属一道，但当时却分属不同的节度使管辖，往来也应事出有因。元稹当时只是一个八品监察御史，有何神通能召已入乐籍、且正受邻那节度使宠爱的名妓前来入侍？薛涛和元稹此前从未谋面，又怎能无缘无故地从西川赶到东川，与元稹“相距数月，形同夫妇”？

有学者提出，元稹在东川查案之后，有时间绕道成都一游，东川的节度使署设在梓州，距离成都仅仅两三天的路程，绕道成都去看望一下武元衡等朋友，因而元稹可能遇上薛涛。然而，仔细查看便知，元稹这次出使东川，行色匆匆。长安梓州间隔1800里，元稹三月七日从长安出发，据《三梦记》云元稹三月二十一日才到达梁州，时经半月而路程仅一半，其到达东川首府梓州约在三月底。不久他又“身骑骢马峨眉下”，再跋涉500多里，前往泸州查处任敬仲；逗留梓州期间，又查察了严励及其属下十二州刺史种种不法行为；返京途中，元稹又在山南西道查办洋、利等三州于两税外加配驿草案，总共查



清了两节度使并其属下实十五州刺史违诏加赋和其他贪赃罪行。五六月间，元稹已经回到长安，除去他在山南西道逗留的时日，元稹在东川启程返京当在四月中旬。如再除去他在泸州审案及往返的时日，可以推测，他在梓州停留的时间未满月。